

阿多诺美学的自然记忆与 “感性共同体”的生成

丁文俊

内容提要 通过记忆诗学的视野，阿多诺在自然历史的辩证结构中发掘自然的价值，激活存在于前启蒙时代的情感和爱欲，这是一种“自然记忆”的理念。阿多诺通过摹仿自然美的方式将自然记忆引入艺术作品，试图通过艺术对魔幻痕迹的救赎重新呈现被异化理性遮蔽的感性经验，以艺术语言言说的途径表达自然记忆所包含的潜在内容，从而为想象替代性的社会结构创造契机。阿多诺对自然记忆的救赎和审美乌托邦的构建以艺术语言为载体，在艺术语言对日常语言的更新时刻，审美乌托邦以感性共同体的形式在当下生成。透过阿多诺美学隐含的生成性视角，可以将审美乌托邦接续于现实生活，有助于当代批判理论重估阿多诺的价值。

关键词 阿多诺；自然历史；自然记忆；艺术语言；感性共同体

阿多诺美学立足于奥斯维辛事件对启蒙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不仅在西方美学传统中重新思考审美和艺术的本质和功能，而且以艺术为载体构想替代性社会秩序的潜在形态。玛尔塔·塔法拉认为，“阿多诺关于记忆自然美形式的思想，是其宏大的记忆哲学的一部分，它包含了对所有以虚假的进步之名所做的征服和侵害的记忆”^[1]。由于阿多诺对艺术和审美问题的思考建基于对受难记忆的悲悼和反省，他的美学思想可以被视为“记忆诗学”。阿多诺广为人知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2]，展现了阿多诺美学的深层次主题，即通过对奥斯维辛事件的反思重构艺术创作和接受的合法性基础，这也是当前中国学界从记忆伦理角度切入阿多诺美学研究的主要路径^[3]。而在阿多诺美学思想中，“自然”是和社会历史具备同等重要性的另一个记忆主题，阿多诺认为自然的祛魅和弱化是理性同一性走向异化的开端，他试图重新确立自然的价值和意义，并将其纳入艺术作品，将自然记忆的救赎作为促成乌托邦呈现的契机。

概言之，阿多诺从“美学—政治”层面对历史记忆的保存和表征的思考，不仅将社会历史方面的受难记忆纳入艺术生产和审美体验，而且将源自前

文明时代的自然意象确立为有待救赎的记忆主题。由于艺术对自然记忆的表征方式和语言的言说密切相关，阿多诺对语言的功能属性的批判和改造，为如何将审美乌托邦的激进性构想移置入经验现实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一 自然记忆的构造： 阿多诺理论中的“自然”

阿多诺的美学思考包含了双重问题意识：一方面面对紧迫的时代问题做出回应，把艺术和审美视为切实反思奥斯维辛的重要载体和契机；另一方面，将美学思考置于形而上学的谱系中，接续康德的美学传统，将自然和自然美重新确立为现代美学的重要主题。阿多诺写道：“然而，艺术和自然尽管处于纯粹对立，二者各自相互指代：自然对于经验而言，是一个经过中介的和对象化的世界；艺术品对于自然而言，则是经过中介的直觉性的全权代表。因此，对自然美的反思是艺术理论不可或缺的元素。”^[4]阿多诺立足于自然的停滞性面向，即一种和线性进步的现代性理念相区别的形态，将自然转化为反思个体和世界关系的他者性存在，试图揭露

历史进步主义哲学对压迫性向度的遮蔽。

阿多诺的前一种问题意识与对受难历史的悲悼密切相关,这是他的哲学思想被视为“记忆哲学”的主要因素,而他立足于西方美学谱系对自然和自然美的理论思考,是否也可被视为“记忆哲学”的一部分?阿多诺著作的重要英译者霍洛特-肯特使用了“自然记忆”(memory of nature)的构词,然而他尚未对该词组指涉的历史哲学视野及涵盖的范围进行详尽的理论建构,并以“自然记忆”完全代指阿多诺思想中的“记忆”范畴,弱化了阿多诺对社会历史范畴的受难记忆的重视^[5]。有必要立足阿多诺的总体思想对“自然”的构造,阐述“自然记忆”作为理论概念的可行性和构成内容。

如何理解阿多诺美学的“自然”?《自然历史观念》中有以下界定:“如果要我解释这个我意欲消解的自然概念,那么,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个概念翻译为一般的哲学概念语言,而与之最切近的就是神话概念。”^[6]安德鲁·鲍伊谈到,“阿多诺在学术生涯中始终运用来自这个文本中的理念”^[7]。作为阿多诺的早期讲稿,《自然历史观念》被视作贯穿阿多诺后期学术生涯的纲领性文本,阿多诺将“自然”定义为与“神话”相同一的概念,这种阐释“自然”的思路可以为理解阿多诺后期美学对“自然”的定位提供参考。彼得·戈登认为,《自然历史观念》的要旨,是对“自然的历史化”:“演讲要表达的目标是消除自然与历史的物化式对立,在这种对立中‘自然’寓意那些缺乏变化或被赋予神话式的无时间性特质的事物。”^[8]“自然的历史化”是阿多诺对“自然”和“历史”关系的辩证处理,重新将被忽视的具有稳定而非发展属性的“自然”置入由理性主导的历史进程。自然历史观念的建构表现为对本体论思潮所包含的崇尚主观理性的取向进行澄清,阿多诺质疑本体论哲学将“存在”塑造为一个超越性、命定性的概念,实际上这是主观理性在忽视历史构成内容的前提下对生存模式的预先设定,任何与预设的存在模式不相符合的对象均被降格至偶然性的范畴,而针对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被忽略。阿多诺因此指出,本体论哲学忽略了自然的停滞属性对理性之于认识外部世界的有限性范围和作用限度的启示性意义。阿多诺关于自然

历史的构思来源于本雅明的巴洛克悲悼剧的研究,尽管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如何将神学方法论用于社会批判和革命运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本雅明的讽喻理论展现了历史进步论所遮蔽的苦难和原始意象,成为阿多诺用以质疑理性同一性的主宰地位并构建新的历史哲学的基础。阿多诺试图重新认可和深入阐述的“自然”概念,与历史哲学的重构密切相关。阿多诺将“神话”等同于“自然”,显然,我们并不能将“神话”理解为一种文学题材,而是需要在批判理性同一性的历史哲学视野下,将之理解为在线性进步的历史叙述中被遮蔽的原始景象,从而针对同一性思维范式的绝对正当性和有效性范围的边界提出质疑。

《自然历史观念》对自然和神话的讨论集中在哲学思辨层次,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则从社会学的层次以自然和神话的特性对启蒙现代性的思维逻辑及其政治统治术进行批判,在社会政治的层面展现阿多诺对自然的界定。《启蒙辩证法》开篇写到:“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9]启蒙现代性的目标是通过理性思考引导主体在蒙昧状态中觉醒,将神话时代由幻想的诸神主导的外部世界,转换为一个遵循可供认识和把握的客观规律进行运转的世界。表面上看,启蒙和神话两者截然对立,然而,客观规律的思维逻辑正是理性同一性,统治阶层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套以等价交换的法则为根基、以社会全体成员的行为为管理对象的社会秩序,并通过将理性的绝对崇拜而赋予其必然正当性,正因如此,阿多诺深刻指出,神话世界中诸神的统治地位被理性同一性所替换,诸神创造的世界演化为由同一性逻辑主导的抽象同质的世界,启蒙变成了新的神话。由于阿多诺将“自然”视为一个可以和“神话”相互替代的概念,他关于启蒙现代性和神话具有同构性的批判,是在负面意义上指出自然包含服从等级区隔的社会秩序和顺从命运安排这两个方面的内涵。考虑到阿多诺在美学维度和历史哲学层面对自然的思考落实于自然对启蒙现代性的纠偏价值,自然所涵盖的负面内容并不属于记忆诗学视野下阿多诺期待在审美中救赎的内容。

神话和启蒙的张力性结构关系也就是自然历史

观念的内部张力。在启蒙延续神话所包含的统治逻辑的同时,统治阶级利用技术的发展完善对大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遮蔽自然和神话所包含的正面内容。阿多诺以奥德修斯返航的故事为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今天,大众的退步表现为他们毫无能力亲耳听到那些未闻之音,毫无能力亲手触摸到那些难及之物,这就是祛除一切已被征服了的神话形式的新的欺骗形式。”^[10]水手的状况正是大众的写照,大众被转换为生产流水线中的机器,身体在面对经验世界时丧失了做出敏锐反应的自主性能力,由此个体的想象力被限制在由预设的生产模式支撑的社会体制之中。在这个基础上重审自然历史观念的张力性结构,阿多诺指出,“哲学着手唤醒密码化和石化了的客体的主题,从而形成了自然历史概念”^[11]。历史进步主义依靠理性同一性原则征服自然和管制大众,与之相反,卢卡奇和本雅明则将自然视为有待重新激活的对象,因为自然包含了丰富的身体爱欲和情感体验,这种异质的生命体验来源于神话世界中人们对诸神的想象、对万物的恐惧和敬畏以及巫术仪式中丰富多样的情绪表达的经历,上述这些无法被同质化、无益于进行工业劳作分配的内容在现代性的社会规划中被祛除,阿多诺则试图在自然历史观念的视野下重新激活自然所包含的感官经验和想象力。

阿多诺将“自然”视为和“神话”相等同的概念,这是立足于批判理性同一性的问题意识,重新发掘自然所包含的经验和想象力,对自然的推崇并不是由于处身现代社会而萌发对前文明时代的怀旧式乡愁,而是和当下的社会境况密切相关。那么,“自然”在阿多诺思想中以何种构型存在?

我们可以从阿多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术的分析入手。“在每个时代里,所有人对似水流年——不管是古老的游牧生活,还是所有前父权社会——的缅怀追忆,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并在人类意识中被彻底清除掉”^[12]。阿多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统治手段并不是强制性暴力,而是以柔性的手段将大众的思考局限在既定模式之内,这种统治方式就是对记忆的清除。规划中的清除对象是“游牧生活”和“前父权社会”,在启蒙现代性的叙事中,这两种社会形态属于低等且需要被超越

的历史时段,然而前启蒙时代正是阿多诺意图重新评估的神话时期。阿多诺对统治阶级清除历史记忆的指控,不能被理解为对前文明时代的怀旧式美化,他在质疑本雅明的“无阶级社会”设想的通信中已经写到,“因此,对我而言,古代和现代相结合的范畴更应该是一场灾难,而非一个黄金时代”^[13]。阿多诺认为理应将古代和现代的结合理解为“灾难连续统一体的历史思想”^[14],他深刻地意识到前启蒙时代包含了更残酷的暴力和压迫问题。他之所以试图重新激活前启蒙时代,其原因是为了超越启蒙现代性的线性历史观念,发掘前启蒙时代所包含的自然意象,即自然概念所包含的正面内容——丰富的情感和爱欲的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多元想象力,进而在自然历史的辩证结构下,激活自然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种新的认知范式,正如莫顿·斯库尔曼所概述的,是“一种不断瓦解和修正自身建构的任意同一性的理性思维形式”^[15]。因此,阿多诺崇尚的自然概念属于有待被救赎的记忆范畴,需要通过重新激活大众对前启蒙时代的“回忆”(remembrance)予以呈现。“回忆”是阿多诺用以对抗统治阶层意图清除记忆的逆向手段。对于“回忆”,阿多诺深入解释道:“超验的回忆需要立足毁灭才能得以保留,否则将变得不再可能;永恒并非呈现为如此,而是通过易毁灭事物的衍射而显现。”^[16]阿多诺挪用本雅明的“星丛”概念,不同历史时段在星丛结构中被转换为相互并置的对象,从而发生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将“易毁灭事物”,即被遮蔽的自然意象,在当下予以转换并呈现,促成自然意象得以表征的手段正是“回忆”。

因此,阿多诺理论中的自然作为有待救赎的记忆构型而存在,可被命名为“自然记忆”,和社会历史范畴的受难记忆共同构成阿多诺记忆诗学的两个部分。阿多诺将自然确立为需要救赎的记忆形态,一方面,他指出自然所涵盖的情感体验、身体爱欲和由此激活的想象力,来源于理性同一性取得主导地位之前的神话时代,这是需要回溯并予以救赎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阿多诺并非简单将自然视为有待复制重现的历史档案或怀旧乡愁的寄托所,而是立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需要,促使大众对自然进行主动的回忆,在救赎自然的基础上,进而

通过思想实践为想象替代性的乌托邦创造契机。简而言之，阿多诺思想的自然正是一种面向当下并且有待救赎的记忆形态。

二 自然记忆、艺术语言与审美乌托邦

自然作为一种有待救赎的记忆形态，被阿多诺赋予了想象替代性社会秩序的潜能。霍洛特－肯特指出：“《自然历史观念》开启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为了将神话的表象阐述为隐含了和解的可能性。”^[17]美学在阿多诺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位置，而自然同样是西方现代美学必须回应的核心主题，在阿多诺意图实现和解的审美乌托邦构想中，与神话表象密切关联的自然记忆如何被纳入审美和艺术？以何种方式参与审美乌托邦的建构？阿多诺先是梳理了自然和自然美在西方美学史中的地位持续下降的进程，随后指出：

在康德思想中，主体的自由意识的发展使得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变得过时，但是，面对多年的不自由状况，这种自由意识让位于主体的焦虑。在自然之美的体验中，自由和焦虑的意识融合在一起。^[18]

阿多诺对美学史上自然和自然美地位的变化的论述，并没有局限在感性学层面，而是将自然美的衰亡历程和主体的膨胀相关联。在主体和自然的地位升降易位的变化趋势中，由于被认为缺乏对理念的呈现，自然降格为低等的审美层次，在黑格尔看来，“理念的最浅近的客观存在就是自然，第一种美就是自然美”^[19]。不仅如此，自然在个体介入外部世界的实践中沦为被征服和占有的对象。但是，启蒙现代性所许诺的自由状况并没有得到完全兑现，阿多诺在一次讲座中提及，“进步的道路包括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特定的人类团体发现自身被驱逐，根据这些团体的起源与意识形态，他们显然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但是这些团体突然恰恰丧失了其自身历史与意识形态所指向的资产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20]大众在征服自然并摆脱了对不可知命运的恐惧之后，并没有在启蒙现代性的理想国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反而陷于马克思所描述的以物化为基础的异化劳动：“在被国民

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1]马克思所洞察的劳动对象化的状况，在20世纪前中期得到更为极致的显现，个体与一切事物均被纳入以产出优先为基准的量化计算体系，个体主体性被异化的理性反噬。阿多诺将抵抗的希望寄托在艺术所激活的“回忆”行动中，正如玛丽－安德烈·里卡德的研究，“借助艺术与反思，自我摆脱了由他费心地建立起来环绕着他的界限，‘回忆’他自身的本性，根据阿多诺的说法，不管怎样，占统治地位的死亡很可能将会消失”^[22]。如何摆脱统治意识形态利用工具理性对个体主体性的禁锢，是阿多诺在审美领域推崇自然记忆的现实动因。

那么，在阿多诺美学中，自然记忆以何种方式进入艺术生产和审美体验？阿多诺写道：“即使在过去，将自然描绘为静物式的自然，才可能是唯一真实的，即绘画知道将自然读解为历史的密码，而非任意历史事物的转瞬即逝。”^[23]赵卿在神学视野下阐述阿多诺的“自然”观念：“阿多诺反其道而行之，运用否定不断地转变对自然的传统认知，通过神学揭示出被物质人类史所歪曲的自然本身，由此自然在救赎中具有了体现真理的神圣性。”^[24]阿多诺在美学中重新激活自然的价值，并不是意图在再现层次复制某种自然景观。自然并不是作为某种描述主题进入艺术作品，而是利用艺术形式所具备的否定潜能，以“静物式的自然”的状态进入艺术，涵盖理性范畴以外的真理性内容，这正是自然历史视野下等待救赎并作用于当下的自然记忆，兼具认识论和历史哲学的视野。

具体来说，阿多诺将与前启蒙时代相关联的自然记忆引入艺术表征，“艺术被一个矛盾所激发：作为魔幻时代的遗迹，艺术的魅惑力量不断被视为非中介的直接感性，被世界上的进步觉醒力量所否定，魔幻要素尚未可能存在就被祛除”^[25]。阿多诺不再遵循启蒙哲学的传统，将自然看作实现绝对理念的低级阶段，而是推崇魔幻痕迹的感性内涵，这正是启蒙现代性意图摒弃和否定的自然记忆。王才勇认为，“既然不在主体的控制范围内，自然美就是自由的了”^[26]。阿多诺将艺术对自然的表征

视为构建非同一性哲学并通向自由的契机，他尝试发掘隐匿于艺术中的魔幻痕迹，这种魔幻痕迹是通过艺术的感性契机而得以保留的原始震动，其整体结构已经被破坏，仅仅以痕迹的形态残存于艺术形式中，这是对神话时代的追忆。阿多诺进一步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作品确实是存在于物化时代的原初时期震动的残留影像；物化时代的恐怖则通过面对物化的客体得以扼要地再现。”^[27]阿多诺寄希望于借助艺术作品的幻象，颠覆作品的整体性结构，以艺术形式为载体，对残存于物化世界中的自然记忆予以表征，从而再现未加节制的情感表达和爱欲诉求，这是一种尚未被纳入同一性体系，并且为人类所共同享有的生命体验。阿多诺将摹仿论和单子结构分别确立为艺术创作的本质和艺术作品的根本结构，丰富的情感体验通过艺术对自然美的摹仿进入作品，并且在单子结构中得以保留，从而避免受到工具理性的思维范式以及由此导致的碎片化的现代情感模式的改造。人们通过重新体验前文明时代对大自然的恐惧，走出理性可完全改造、控制自然并垄断真理的启蒙神话。与此同时，阿多诺对自然的推崇是在自然历史的辩证结构之中的取向，他并不提倡建立在反理性基础上的自然必然性观念。他认为，“如果辩证法不可遏制地将理性转化为自然的绝对对立面，如果理性中的自然本身被遗忘，理性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转向野蛮并向自然倒退”^[28]。因此，阿多诺的意图是借助艺术的感性契机激活自然记忆，在承认理性的价值和必要性的前提下，警惕据有权力位置的集团将理性改造为失去反思性的纯粹工具。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得以进一步思考阿多诺美学中自然记忆与审美乌托邦的关系。我们需要从自然记忆得以产生并进入艺术的手段——摹仿谈起。阿多诺的摹仿论被不少研究者视为构造审美乌托邦的重要契机，例如埃里克·纳尔逊指出，“摹仿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关于感性自由的承诺，这种感性自由是有趣而有接受力的自发行为，没有被社会整合的一致性和规训所吸纳”^[29]，原因是阿多诺改造了传统的摹仿论，“在这个视角下，艺术不是对自然的摹仿，而是对自然美的摹仿”^[30]。至于何为“自然美”，阿多诺如此阐述，“自然美是停顿的

历史，是发生停滞的时刻”^[31]。具体而言，假如艺术仅仅是对自然物的简单复制，那么自然物将被视为意义固定的对象而被整合进既有的知识谱系。而与之相反，艺术摹仿自然美的结果，自然美以“停滞的时刻”的姿态和线性历史观相决裂，拒绝被纳入既定的概念模式接受整合，而是时刻处于具有生命活力的流变进程之中，启蒙时代以来大众与自然之间的分隔状况因此得以终结。自然美在转换为艺术作品的过程中不断超出既有概念的定义体系，遵循否定辩证法的客体优先性逻辑，自然物自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将在摹仿过程中被转化为艺术的否定性特质。同时，正如自然历史的视野包含了自然和历史二者之间的辩证互动，艺术对自然美的摹仿和主体的理性反思能力紧密结合，内森·罗斯将之形容为“批判性的摹仿”——“在现代理性的状态下对客体亲和力的挽救”^[32]。因而，阿多诺的摹仿论指向主体的重建，将自然纳入获得具有理性反思能力的主体的认识视域，被遮蔽的自然记忆将得到重新发掘，为想象潜在性的乌托邦提供可能。

关键的问题是，艺术作品所保存的自然记忆如何促成审美乌托邦的呈现？阿多诺给出的答案是，将自然记忆转换为以否定性为主题的艺术作品的语言。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物化逻辑发展到极致的时代，只有真正的艺术作品可以在物化时代幸存。阿多诺从语言论的角度进行阐发，“作为一种包含整合与调解的人类语言，艺术试图再次通往自然语言之于人类已经晦暗的内容”^[33]。在阿多诺看来，表达否定性价值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它作为一种“非概念语言”，达成个体与自然记忆之间的融通关系，从而超越既有的同一性概念的框架，具有表征以密码形式存在的审美乌托邦的能力，这是艺术展现可能性世界的潜能。对于阿多诺的语言论，我们需要回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神学思想脉络中予以理解。本雅明提出关于原初语言的神学论述，“因此，人类的语言性存在就是对事物进行命名”^[34]。在原初语言阶段，名称与事物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工具理性时代，词与物相分离，语言的功能是对物的工具性用途进行言说，语言不再能够达致事物自身。原初语言的言说则是人类在感知上帝神谕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命名过程，这

是一个通过言说创造新事物并为之命名的事件。阿多诺将本雅明的语言理论进行世俗化的转换,以艺术语言概念取代了本雅明在神学范畴下所使用的原初语言概念。艺术语言对自然记忆的言说,就是一个摆脱预设框架对自然所包含的潜在性内容进行呈现的过程,因而得以超越物化社会境况,建构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分离的乌托邦,实现将自然记忆从静默无声转向被言说表达的状态。

简言之,艺术语言是记忆诗学视野下阿多诺美学的重要维度。区别于处在语词和事物相分离阶段的工具性语言,艺术语言具备表达非工具性的情感体验和潜在事物的创造性能力,从而表征自然记忆并建构审美乌托邦。

三 日常语言的更新: “感性共同体”的生成

从阿多诺对自然记忆的构造和运用出发,聚焦于阿多诺赋予艺术语言的重要性,可以为今天重新理解他的审美乌托邦构想的价值提供新的思考角度。总体而言,阿多诺反对通过任何类型的实践将审美乌托邦转变为现实,这正是阿多诺美学在当代受到诟病的主要理由。阿多诺将乌托邦建构于和经验现实相割裂的审美领域,因为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的取向而陷入大众没法操演的困境。正如祖德瓦特的评论,阿多诺将自律艺术和否定辩证哲学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这两种倾向均使艺术真理成为少数人的秘密”^[35]。对阿多诺思想是否具备实用性的反思同样见诸中国学界。朱国华援引卢卡奇的描述,用“峭壁上的宾馆”形容阿多诺的思想所处的困境,“否定辩证法的张力结构具有一种不断走向反思与否定的动态性,但是在经验操作层面它似乎是不及物的”^[36]。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阿多诺美学因其“不及物”的性质,似乎只剩下了展示激进批判立场的价值。然而,通过自然记忆和审美乌托邦的关系可以看到,以艺术语言的方式言说自然记忆,是促成审美乌托邦呈现的路径,而语言恰恰和日常生活的对话、交流密切相关。那么,艺术语言是否可以在某个时刻转换为日常语言,从而将处于彼岸世界的审美乌托邦挪置于日常生活?

自然记忆促成审美乌托邦的呈现,基于艺术语言对潜在世界的言说,阿多诺所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日用语言已经为物化社会所同化的现状,大众无法接触前文明时代的情感和爱欲,因而失去了对非存在物的表达能力。阿多诺承继本雅明关于人类语言发生了从原初语言向工具语言阶段性衰退的观点,并对本雅明的神学语言观念进行世俗转换,将语言在启蒙运动中的唯名论转向,即语言朝向精确界定的科学化、概念化的演变以及由此导致的语言工具化的结果,和资产阶级不断对社会交往加强管控的统治现状结合在一起,语言的科学化转向和资本的统治具有同谋的关系。阿多诺指出,“启蒙运动最终不仅摧毁了象征符号,而且也摧毁了它的继承者,即一般概念;与此同时,启蒙运动除了产生于集体又惧怕集体的抽象恐惧之外,没有残存下来一点儿形而上学的因素”^[37]。资本主义时代的语言是一种祛魅后的科学语言,以中立的名义对语词所包含的边界和专有使用范围予以精确界定,至此语言不再是象征符号,只是一系列抽象化概念的结合,与资本主义社会推崇一般等价物的运作法则具有内在一致性。个体对原初神话的丰富情感由于和界限严明的专有名词或实证概念相冲突,在语言的标准化过程中被祛除,个体由此失去了和残存于语言中的自然意象进行沟通的机会。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是,大众受限于单一化的经验和贫乏的想象力,不仅无法延续语言在形而上层面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而且大众内部的交流和沟通日益走向工具化和片段化。阿多诺因而指出,“净化人情感的黑暗和无效与灭绝人性的前进正好正比例”^[38]。本雅明对德国社会得出类似的结论:“所以,他们整个给人留下了愚笨的形象:没有自信,即生命攸关本能的失落以及疲软,也就是智力衰退。这就是德国市民的整体状态。”^[39]阿多诺和本雅明所描述的正是工具性语言所主导的社会图景。

阿多诺对此的回应策略是,“与此相反,辩证法却要把每一种图像解释为文字,它要人们根据图像的特点来认明它的虚假性,或者使其失去效力,或者使其符合真实”^[40]。阿多诺反对启蒙现代性将语言确立为以抽象概念为根基的中立性符号系统,提出将包含自然记忆的图像引入语言系统,通

过重新赋予语言以价值观念和情感色彩,从而在某个时刻促使围绕概念建立的工具性语言体系失去有效性,将语言的功能性质从言说概念以服从于工具性使用的便捷需要,转化为以言说特殊的客体对象的具体性质而进行对话和交流。将图像引入语言系统的改造和表达,与艺术具有显而易见的相似性。在阿多诺看来,具有批判性和救赎意义的语言将是艺术语言,“在艺术中,当艺术最紧密接近语言的地方,艺术的普遍效用最有力,即当艺术言说的时候,通过言说而逾越了此时此地”^[41]。艺术以摹仿自然美的方式超越针对自然的概念性界定,从而转换为以客体优先性为原则的双向交流,并由此克服过度膨胀的主体理性对外在客体的占有欲望,彼得·奥斯本因此指出,“这种非概念性特征对艺术在形而上方面成为‘被压制的自然的代言人’的角色至关重要”^[42]。被遮蔽的自然记忆将通过艺术语言的言说得以表征,这正是审美乌托邦的构建过程,语言不能与诸个体之间的社会交往相脱离而成为超验性存在,因此,通过语言的中介,基于自然记忆的审美乌托邦具有转换为现实生活形态的可能,而不是只能在神学意义上等待处于无限久远状态的审美救赎的发生。

审美乌托邦以何种形态和方式被移置到现实世界?首先,阿多诺辩证地指出,艺术作品的形成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模仿中的记忆痕迹,为所有艺术作品探求,同时总是超越主体和集体分裂状况的期望所在。然而,艺术作品中的集体记忆并非与主体相分离,而是通过主体的方式得以发生;集体构型在主体的特异冲动中得以呈现”^[43]。阿多诺美学重视艺术在幻象和形式方面所具备的表征真理内容的潜能,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局限于艺术结构内部的形式美学体系,而是一种艺术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艺术通过隔绝于社会秩序的单子结构所保存的真理性内容,包含了构建替代性社会秩序的资源,也就是说,审美乌托邦具备了共同体的集体性视角,艺术则是在个体和集体之间搭建和解关系的载体。艺术对自然记忆的表征,通过摹仿将自然记忆纳入艺术生产过程,再通过艺术语言对自然记忆的言说促成乌托邦的呈现,这个过程和主体所置身的集体环境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语言和记忆在很

大程度上均不是某个个体的独白,阿多诺反对将语言禁锢于内在性而导致病态的自恋,“内在性是一种自身循环,缺乏任何的抵抗,拒绝承认任何可能阻止其无止境运动的事物,因此充满神秘的光环”^[44]。语言对记忆的表征将发生在特定共同体的内部,具有公共属性,而不是仅仅面向自身的私有语言。

其次,阿多诺进一步探讨共同体内部的交往主题和潜在范围。在他看来,“在管制性的世界中,艺术作品只能在促使不可能沟通之物得以沟通的形式以及对物化意识的打破中被充分理解”^[45]。罗杰·福斯特认为,“在语言范畴,哲学阐释的目的是恢复依附于符号的含义,这可以被理解为试图将特定历史语境中主体的经验用言说表达出来”^[46]。阿多诺意图救赎的自然记忆,在管制性社会中属于被禁锢的内容,而艺术可以通过形式抵制异化社会的支配,通过对自然美的摹仿实现对自然记忆的言说,进而在共同体内部围绕情感和爱欲等失落经验的主题展开沟通和对话,这是基于自然记忆的审美乌托邦的现实形态——感性共同体。感性共同体和个体的生命意识密切相关,具备流动性和多样性的非同一性特质,这是一种与既定社会秩序相区隔、由德勒兹等当代批判理论家所主张的动态式“生成”(becoming)。需要意识到,阿多诺将真正的艺术的范围限定在自律艺术,反对向大众的审美趣味妥协。他如此评论贝克特的作品:“它们(作品)所包含的最少程度的幸福承诺,拒绝转换为任何形式的慰藉,仅仅在达致去世界化(worldlessness)的纯粹言说作为代价的情况下才能实现。”^[47]阿多诺将贝克特的荒诞剧和策兰以语言实验著称的诗歌视为最理想的艺术作品。艺术语言对自然记忆的言说具有晦涩性和反常规的特质,感性共同体一方面可以通过打破走向程式化的异化沟通状况,逾越管制性社会秩序的同化和整合,另一方面则只能在近乎“去世界化”的极限状态中,即小范围群体和短时间的瞬间中才能生成。

简而言之,借助艺术语言对日常语言的渗透和改造,自然记忆所寓意的情感和爱欲转换成日常生活的主题,流动、杂多的生命状态逾越工具理性社

会的同一性模式的禁锢，感性共同体得以生成。同时，感性共同体在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广度取决于日常语言更新的程度和限度，这并非某种政治组织形式的规划，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特定持久的生活方式，而是表现为一系列生成瞬间所构成的星丛，是对不同时段发生的极限状态的汇集。总之，感性共同体是审美乌托邦在生活世界中的可能性形态，一方面由于感性共同体的组成内容和自然记忆密切相关，自然记忆所包含的情感和爱欲内容有助于抵制统治意识形态的记忆禁令，大众得以秉持始终与预设的思维惯习和社会秩序相冲突的非同一性立场，审美乌托邦的批判性在转向现实生活中得以保留；另一方面，感性共同体的生成建基于艺术语言对日常语言的渗透和更新，语言的交流和沟通不仅具有公共属性，而且和大众的日常生活不可分离，因此审美乌托邦的激进美学构想通过语言的中介转换为经验生活的瞬间形态，不再仅仅是不及物的“峭壁上的宾馆”，这为当代批判理论阐发阿多诺的思想创造新的路径。

结 语

阿甘本对阿多诺曾有这样的批评：“我们再来看看阿多诺有关‘魔法’的那段话，可以说他作为辩证历史主义的代言人，是将王子变成青蛙的巫婆，她相信自己握有辩证法的魔棒，掌握变形的秘诀。”^[48]这段批评针对的背景是阿多诺和本雅明的第三次论争。阿甘本据此指出，阿多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了庸俗化的因果决定论关系，本雅明则通过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融合为社会实践的一体两面，在实践进程中激活“弥赛亚时刻”，从而对上层建筑进行创造性再建构。简言之，阿甘本将阿多诺贬低为一名固执型学究，缺乏在否定性批判之后构想现实性社会秩序的创造力，而倾向于将本雅明推崇为一位具备激活日常生活实践的抵抗潜能和重构社会状况能力的创造型思想家。阿甘本对阿多诺的负面评价在当代左翼学者群体中具有代表性，尽管否定辩证法被接受为批判理论的支柱性思想方法之一，然而无法在揭示权力运作的机制之后，激活个体作为行动者在社会生活

中的抵抗性和创造性的潜能，这被普遍视为阿多诺思想的缺陷。由德勒兹通过阐释尼采而开启的生成论视野，通过激活生命力量的潜能从而促成与社会秩序相断裂的“事件”发生，成为当代批判理论的重要范式。

从自然记忆的视角来看，借助艺术语言对自然记忆的言说，丰富的情感经验和爱欲在建基于否定辩证法逻辑的审美乌托邦中被保留下来，同时，通过艺术语言对日常语言的渗透和改造，感性共同体将在当下的某个瞬间生成，这正是一个生命政治的“事件”，审美乌托邦以感性共同体的形态进入经验现实。可以看出，阿多诺美学同样包含了生成性视角，具备通过在现实生活中激活生命体验从而建构替代性社会秩序的潜能。因此，阿多诺并非阿甘本所描述的保守学究的形象，当代批判理论有必要重估阿多诺思想生成性视角的生产性。同时，阿多诺的生成性视角和后现代思想家不同，阿多诺勾连自然记忆、审美乌托邦和感性共同体的关键连接点是语言，然而艺术语言对日常语言的更新并非发生在某个时刻的语言游戏，而是一项长期的启蒙工程。阿多诺期待的救赎和改造社会的路径，并不是借助一场容易被利益集团操纵的社会运动，而是通过对日常语言的更新，在漫长的时间中通过一系列感性共同体的生成时刻的累积，实现对大众感知方式的根本性改造，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激活人们的想象力，最终重建具备批判意识和反思能力的理性社会。当代批判理论如何重新阐发美学的经验性和超越性的二重价值，将现实世界的改造和彼岸世界的乌托邦相结合，对此阿多诺的美学思考在当今依然具有启示性价值。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戴维森与当代文论的分析哲学向度研究”(批准号18YJC7510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玛尔塔·塔法拉:《自然美学的恢复——罗纳德·赫伯恩和西奥多·阿多诺》，张超译，《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8期。

[2][44] Theodor W. Adorno, *Prisms*, trans. by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p.34, p.262.

[3] 代表性研究参见赵勇《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第99—1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 [4][18][23][25][27][30][31][33][41][43]
[45] Theodor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ed. by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trans. by Robert Hullot-Kentor,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p.62, p.65, p.67, p.58, p.79, p.71, p.71, p.77, p.205, p.131, p.196.
- [5][17] Robert Hullot-Kentor, *Things Beyond Resemblance: on Theodor W. Adorn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0, p.248.
- [6][11] 泰奥多·W. 阿多诺:《自然历史观念》, 张亮译,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辑, 第234页, 第241页,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 [7] Andrew Bowie, *Adorno and the Ends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2013, p.82.
- [8] Peter E. Gordon, *Adorno and Exist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50.
- [9][10][12][37][40]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渠敬东、曹卫东译, 第1页, 第29页, 第24页, 第17页, 第18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13] Ernst Bloch et al,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ed. and trans. by Ronald Taylor, London: Verso, 1980, p.112.
- [14] 理查德·沃林:《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 吴勇立、张亮译, 第184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15] Morton Schoolman, “Avoiding ‘Embarrassment’: Aesthetic Reason and Aporetic Critique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olity*, 2005(3), p.359.
- [16][28]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by E. B. Asht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360, p.289
- [19] 黑格尔:《美学》第1卷, 朱光潜译, 第149页,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 [20] Theodor W. Adorno,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s*, ed. by Christoph Ziermann, trans. by Nicholas Walker,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2017, p.144.
- [2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第91页,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22] Marie-Andrée Ricard, *Adorno l'Humaniste: Essai sur sa Pensée Morale et Politique*, Paris: Édition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2012, p.185.
- [24] 赵卿:《“生态正义”何以可能:两种形而上学辩护》,

《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5期。

- [26] 王才勇、方尚琴等:《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研究》, 第75页,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 [29] Eric S. Nelson, “Aesthetics, Ethics and Nature in Adorno”, in Jerome Carroll, Steve Giles and Maïke Oergel (eds.), *Aesthetics and Modernity: from Schiller to the Frankfurt School*, Bern: Peter Lang AG, 2012, p.328.
- [32] Nathan Ross, “‘The Polarity Informing Mimesis’: The Social Import of Mimesis in Benjamin and Adorno”, in Nathan Ross (ed.), *The Aesthetic Ground of Critical Theory: New Readings of Benjamin and Adorno*,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 2015, p.77.
- [34] Walter Benjamin, *Early Writings, 1910-1917*, trans. by Howard Eiland and Other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54.
- [35] Lambert Zuidervaart, *Artistic Truth: Aesthetics, Discourse, and Imaginative Disclosur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4.
- [36] 朱国华:《峭壁上的宾馆:阿多诺、赵勇与文化批评的可能性》, 《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5期。
- [38] 泰奥多·W. 阿多尔诺:《瓶子中的信息》, 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 方杰译, 第37页,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39] 瓦尔特·本雅明:《单行道》, 王涌译, 第22页, 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 [42] Peter Osborne, “Adorno and the Metaphysics of Modernism: The Problem of a ‘Postmodern’ Art”, in Andrew Benjamin (ed.), *The Problems of Moder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31
- [46] Roger Foster, *Adorno: The Recovery of Experienc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17.
- [47] Theodor W. Adorno, *Notes to Literature*, vol. 2, eds. by Rolf Tiedemann, trans. by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90.
- [48] 吉奥乔·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 尹星译, 第183页,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何兰芳